



西方人咬了“苹果”， “苹果”咬了我们

□林少华

福楼拜在《恋书狂》中写了一个恋书狂：“他爱书的气味、书的形状、书的标题；他爱手抄本，爱手抄本陈旧无法辨识的日期，手抄本里怪异难解的歌德体书写字，还有手抄本插图旁的繁复烫金镶边；他爱盖满灰尘的书页，他欢喜地嗅出那甜美而温柔的香。”设若福楼拜生在当下的中国，我敢打赌，他写的肯定不是“恋书狂”，而是“恋手机狂”：他爱手机的气色、手机的形款、手机的标识，他爱手机的……

青岛开往潍坊的动车组。我放下手中的报纸，起身找洗手间。从车厢这头走去那头，又从那头走回这头。无意中我有个发现：几乎所有人都在注视着手机。为了确认这一发现，我又从这头走去那头，复从那头走回这头。没有人注视我——哪怕我头顶突然冒出一只角——任凭我居高临下地注视两侧的他们和她。我得以顺利确认，除了一对头碰头的现实性恋人和一位歪着打盹的虚拟性失恋者，其余所有人都在看手机。目不斜视，全神贯注，饿虎扑食一般，比课堂上学生看课文不知专注多少倍。由于太专注了，感动之余，我倏然产生了一种近乎惊悚的孤独感或近乎孤独的惊悚感。

返回座位，继续看报。上车前买的本地晨报，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报纸。邻座是位某事业单位办公室副主任模样的中年男士，衣着倒还讲究，但多少沁出磨损感。也是因为他的目光一度离开手机往我端着的报纸瞥了一眼，我以为他感兴趣，于是看完后把报纸叠起递了过去。他点头道谢，随手将报纸插在眼前椅背的口袋。他继续看手机，一直看到我

下车。已经看了80分钟！我有点儿后悔，后悔不该强加于人。看手机又怎么了？看书看报看杂志就比看手机有品位有教养有文化不成？何况你怎么知道人家看手机一定是玩游戏？用手机或在读取部下汇报或向上司请示也并非没有可能。世间存在所有可能性和不确定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也并非多么介意我的邻座看手机，我介意的是整节车厢以至整列动车组的人都看手机——甚至对眼前椅背献媚的美女杂志都不屑一顾——这无论如何都异乎寻常。

不由得，我想起前不久去宁波大学时一位德语老师席间说的话。他说国庆长假期间和夫人带着上初中的女儿去欧洲旅游。“秋天的欧洲大地是多么迷人啊！火车所经之处，田园间的村落和尖顶教堂，牧场上的羊群和成片野花、光闪闪的溪流，静悄悄的山林、红彤彤的晚霞……然而女儿根本不看，不看，就是不看。看什么呢？只管低头看‘苹果’，苹果手机、苹果iPad……一次我和她母亲尝试夺下她的‘苹果’，可女儿一瞬间闪现的是怎样的眼神啊，简直像要跟我们拼命似的。”这位可怜的父亲叹了口气，转而感慨：“可你看车厢里的欧洲人、美国人，哪个看手机？不是看书就是看窗外风光。其实用不着别的，西方只用一个小小的‘苹果’、小小的手机就把我们打败了——西方人咬了苹果，苹果咬了我们。人家咬苹果一口，可苹果一口接一口咬我们，咬我们的孩子啊！”他的声音透出深切的凄凉、无奈与孤苦，听得我们赶紧安慰他：“别担心，你的宝贝千金才上初中，等上高中就好了——苹果树下，百花盛开！”他嘴角曳出一丝隐约的苦笑：

“但愿！”

无独有偶，前天在上海大学，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英语老师告诉我，在美国，无论地铁还是高铁，满车厢乘客大多看书，很少有人看手机。可你瞧瞧咱们这边，有几个人看书？有谁看书？看书的都快成“奇葩”了……我半装糊涂地问道：手机不也能看书吗？“我敢保证，用手机看书的，不可能超过百分之十五。再说，看什么？看《二十四史》还是看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？看你译的村上春树倒有可能。”得得，引火烧身。我借故打住，落荒而逃。

不过你别说，前天我还真沾了手机的光。离开讲座会场，一位当年我教过的学生要请我吃“外婆手艺”上海本帮菜。“外婆”住在僻静的里弄，她去过一次也记不确切。于是掏出“苹果”查找，指着上面的地图告诉我她在哪儿在哪儿快了快了。我半信半疑：那么小的菜馆也会有？就算有，手机地图“快了快了”的距离看起来也不可能“快了快了”。而我又要赶飞机……正这么嘟嘟囔囔地行走着，她用手一指：“到了，39号！”一看，果然。不过门面的确太小了，小得几乎只有一扇门。若非手机指引，笃定看漏无疑。

“外婆手艺”的确够味儿，甚至让我想起自己的外婆。告别“外婆”乘地铁去机场。在地铁车厢，我再次体验了和动车组车厢大同小异的手机冲击，印证了德语、英语两位老师的相关描述，耳畔久久萦回那句话：西方人咬了“苹果”，“苹果”咬了我们！

（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）

中学时代的两位“女神”

□智效民

春节期间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，标题是《中国女人，在总体上放弃自己太早了》，文章一开头就很吸引人：

我经常同老公开玩笑：我到80岁还有人追噢，别人迷不了，82岁的老头没问题的。先生也凑趣，故作咬牙切齿状：你敢，看我怎么煮了你。我更来神：老太太有什么不敢的？活到那岁数，修成个绝代佳人不说，还有纵横天下的色胆儿，这年头谁怕谁啊……

作者之所以口出狂言并由此妙论，是因为她认为女人应该是“二十岁活青春，三十岁活韵味，四十岁活智慧，五十岁活坦然，六十岁活轻松”，到“七十岁就成无价之宝”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她觉得“从整体来看，中国女人似乎缺乏美丽到老的信心和追求”；但在法国，年过古稀却“仍旧风姿绰约的普通女性比比皆是”。

这些话让我想起了中学时代的两位“女神”。

我是1958年考上初中的，因为正好赶上“大跃进”，所以那一年特别好考，简直是有多少要多少。上了初中以后，却遇上所谓“三年困难时期”。于是到了1961年考高中的时候，又变成百里挑一、难上加难。

初中三年，我们的学习生活极不正常，每天不是搞政治运动就是下乡支农，能够正常上课的时间很少。当时评判学生的标准不是学习成绩，而是政治思想和劳动表现，所以年龄大一点的同学比较占便宜，其中最大的便宜就是当班干部。

上了高中以后，教育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“小阳春”，其特点是强调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。不久校方决定恢复期中考试。经过一番比拼之后，班里一位小女生大爆冷门，居然以四门主科满分的成绩名列第一。为此教导处在全校范围内张榜公布给予表扬。期中考试以后，班里调整干部，班主任指定她当班主席，

让另一位女生当学习委员。这两人除了成绩优异以外，还具有面容姣好、身材苗条等特点，于是她们二人便成了男生心目中的“女神”。

我记得这位班主席和我一样都是6岁入学，上高中那年才15周岁。她个子矮小，一头短发，当众说话特别爱脸红。但是当了班主席以后便很快进入角色，除了在班会上滔滔不绝之外，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下乡劳动，她都表现出“巾帼不让须眉”的气概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完全是一位超乎寻常的“女汉子”！学习委员的年龄虽然稍大两岁，却也是一个内外兼修的女强人。

1964年高中毕业后，班主席因为父亲是“右派”，勉强考入北京的一所普通大学，而我却因为政审不过关被大学拒之门外。后来才知道，如果没有学校的保举，她的命运应该和我一样。相比之下，学习委员则因为是革命干部子弟，考入一所重点大学。这所大学是我的第一志愿，因此我隐隐有点羡慕嫉妒恨的感觉。

一晃50年过去了，我已经到了望七之年。春节期间一位老同学打来电话，谈起中学时代的这两位“女神”，不禁感慨万端。她说去年与几个同学组团旅游，顺便去看望了一下“失踪”多年的学习委员。见面后才知，这位“女神”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油田工作。因为条件过于艰苦，她随丈夫调到南方的一座海滨城市，又因为这个单位不给家属安排工作，所以她只好进了一个很小的施工单位。多少年来，尽管她有名牌大学的文凭，却无法施展才华，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，最后她只能拿到比下岗工人略高一点的退休金。如今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照着两个孙子，并且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两个小家伙身上。至于她自己，则早已变成一个白发苍苍、不修边幅的老太太了。我估计，她的一生除了青春之外，所谓韵味、智慧、坦然、轻松和

美丽到老的信心之类，早已被无情的命运剥夺殆尽。

与学习委员相比，班主席则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老母亲身上。她大学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而留校工作，恢复高考后还多次代表学校返回省城招生，顺便看望年迈的双亲。老父亲去世以后，她把母亲接到北京。如今她母亲已经瘫痪多年，后来又患了老年痴呆症，于是她要用所有时间和精力来护理母亲。

前几年我刚到北京，曾打电话约她见面，却被她婉言谢绝，这让我很不舒服。后来才知道，老母亲已经到了一刻也离不开她的地步，不用说出门约会，就是有人登门拜访，她也害怕因为招待客人而耽搁了照顾母亲。

正因为如此，当年的两位“女神”为什么会过早地放弃自己，就成了我想寻找的原因。就个人而言，她们当时是在“重理轻文”的思潮下选择理工科的。从表面上看，这种选择能让人拥有进可报国、退可糊口的一技之长。但是如果没有人文精神的支撑，理工科教育只能是把人变成“会说话的工具”的一种手段（爱因斯坦语）。遗憾的是时至今日，这种重理轻文的危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。

就社会而言，如今国家虽然拥有雄厚的财力，但在教育、养老等民生问题上的投入却很欠缺。因此两位“女神”只能为老人和孩子牺牲了自己的晚年。

与如今的中国大妈相比，两位“女神”可能属于个案。但无论是抢购黄金被套牢还是跳广场舞被泼粪，大妈们仍然会给人一种无比辛酸的感觉。由此可见，对于中国女人来说，要想像法国女人那样拥有风姿绰约的晚年并优雅地老去，恐怕还需要一场新的启蒙。

（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，著有《长袍与牢骚》）